

201-223

「妳媽媽的故事有什麼好寫的？」 —生產「禮讚女性」教學知識的行動敘說

蕭昭君*

這一篇報告運用觀察札記、訪談學生、分析學生作業等資料收集，以故事敘說方式，呈現自己在帶領學生投入有關女性知識生產的教學過程中遇到的質疑與困頓。為企圖扭轉獨尊男流知識的不當，以豐富學生多元理解人類知識的機會，在「教育專題研究」課程中，我鼓勵學生挑選「身邊」自己所「尊敬」的女性，深入探究她們的生命故事，書寫成為研究報告。學生實地參與有關在地的女性知識的生產，共同看見、聽見身邊平凡女性不同的生命經驗，揭開個別故事背後清楚的共同文化結構，如何成為壓迫女性集體的存在，以及記錄見證不同的女人如何發展努力面對生命的能量。另外，為了讓學生了解教育知識的多種呈現形式，我也安排機會讓學生學習以拼布藝術形式來表現研究成果。包含二十位台灣女性的大拼布，集體說明她們的生命故事，她們散見在台灣不同角落、社會位置、族群、年紀、階級，代表成千上萬類似生命遭遇的女性。她們的故事，提供一個深入了解父權文化的窗口，讓我們有機會正眼凝視父權文化對於女性與男性的壓迫，以及正眼看見女性在面臨各種困頓中所展現豐富的主體生命力。從反身這個課程與教學，我提出有關在地女性主義教育學的新觀想。

關鍵詞：女性主義教育學、性別平等教育、行動敘說

* 蕭昭君：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jjh@mail.nhlue.edu.tw

“What’s So Great About Writing Your Mother’s Life Stories?”: An Action Research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bout Women

Jau-Jiun Hsia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lluminate the interweaving process of gender, power and knowledge in my educational research course. Inspired by Judy Logan’s teaching stories, I invite senior students in my course to conduct in-depth studies in honor of women from their daily worlds. By ways of prolonged engagements and interviews with their respondents, students learn to acquire deeper understandings of these women’s lives, thus, open their eyes to see through the structural oppression of women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o think through how they can transform such new understandings for social justice. In addition to writing up their research papers, students learn to make their own quilt as another way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for their research. I also present an honest account of the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students to produce knowledge about women and of the actions taken to solve these obstacles.

Keywords: *feminist pedagogy,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

* Jau-Jiun Hsia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Huali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妳媽媽的故事有什麼好寫的？」 —生產「禮讚女性」教學知識的行動敘說

蕭昭君

壹、前言：翻轉獨尊男流的教育知識，有這麼難嗎？

國內近二十年來針對各級學校有關教科書性別內容檢視的研究，從最早期的歐用生（1985）檢驗國小社會科教科書，發現偏頗的性別意識型態後，隨後婦運團體與學界也持續關注這個議題，包括婦女新知（1988）、黃政傑（1988，頁 111-123，1994）、歐用生（1989，頁 99-177）、李元貞（1993）、魏慧娟（1994）、蘇芊玲、劉淑雯（1997）、婦女新知（2001）以及莊明貞（2003），大致而言，這些研究共同批判中小學不同科目的教科書所傳遞的知識，內容往往充滿父權與性別刻板的意識型態，不只未能反映當前社會變遷中大量女性走入職場，性別角色必須逐漸改變的現實，更是將女性消音，忽略女性對社會的貢獻，女性缺乏可認同的現代角色。類似的研究發現，也出現在職前師資培育的教科書中，包括楊巧玲（2002）、游美惠（2002）、王儷靜（2002）以及蕭昭君（2002，2003a，2003b）的研究，也發現許多教育專業課程的教科書嚴重的忽略、扭曲性別議題的相關知識，主流的教育專業教科書充斥以男性觀點為主的知識，反映異性戀、中產階級的意識型態，扭曲並邊緣化女性與性別平等觀點的教育知識。

換句話說，從小學到大學所用的教科書，導使準老師在受教育過程中，接收偏高劑量的男性為主的知識，形同以男性經驗的課程代表全人類整體經驗的課程，這種從男性角度定義的課程知識，最大的不當是它的片面性與排除性，忽略佔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的智慧資產。美國的研究者 Wood（1991）的研究指出，女性在教科書中被消音、貶低、忽略、扭曲的事實，至少造成三種影響。一是，學生會認為教科書中教導的男性經驗才是正確、標準的，只有男人才是偉大的、對社會有貢獻的；二是，獨尊一方的知識偏見，阻礙限制學生的視野，影響學生對事件經驗的知識；三是，男性學生知道自己的價值認同對象，清清楚楚的在教科書中現身，女性學生卻欠缺這樣的認

同對象，不被鼓勵做大事。

此外，長期以來作為國家進行各種社會化的師範教育，其校園傳統不管在組織結構、規訓獎懲方式、文化呈現皆與父權政治結構相呼應，在在讓準老師沉浸在父權文化下而不自知，步入中小學現場，自然成為再製性別不平等文化的幫凶（莊明貞，2003，頁 159）。令人懊惱的是，源於批判這種片面、不當的獨尊男流知識而產生的女性主義教育學，在台灣的主流師資培育場域，好比滄海一粟，甚至懸缺¹，絕大部分的準老師沒有機會接受女性主義對於主流教育知識的解構，準老師接收的教育專業知識，往往內化其中的「客觀」與「去性別」（其實是如假包換的父權為尊）、「去政治」、「價值中立」（其實是合理化既有的性別權力不對等），不只看不見其中獨尊男流知識，更不知道所謂知識原來可以從女性主義的觀點進行挑戰、批判、與生產。這樣的現實構成台灣成為平等社會最根本的阻力。

基於這樣的體認，作為一位企圖實踐女性主義教育學的師資培育者，除了在課程當中努力翻轉男流知識，注入更多女性主義觀點的知識，我發現：帶領準老師投入女性經驗的知識生產，可能是更根本的重要工作。在批判男流教材知識不夠完整的同時，更需要生產與之平衡的女性知識，提供學生理解人類多元知識的機會。這一篇報告分享我在師院²教授「教育專題研究」課程中，帶領大四學生生產「有關女性生命史」的行動故事³。就研究方法上，我利用課堂的觀察札記、訪談學生、分析學生書寫的文本等資料的收集，以故事敘說，呈現自己在這個「禮讚女性」的教育專題課程中，如何帶領準老師進行另類知識生產的過程，揭露生產女性知識的教學過程中遇到的質疑與困頓，思索如何建構在地化的教學知識。

貳、行動前：選擇一個多元文化教育知識的生產位置

在我所任教的學系，大四學生必修的「教育專題研究」課程，目的是讓畢業班學

¹ 國內師資培育學者莊明貞（2003：157-165）從圈內人角度，針對國內的師範教育將性別研究作為懸缺課程，提出細緻的分析觀察，她從歷史淵源與政治勢力的影響，說明這是一種意識型態運作的結果。

² 這個師院在 2006 改名為教育大學。

³ 這個教學靈感來自於閱讀美國教育工作者 Judy Logan（1997）在其「教學故事」一書中，所分享的拼布故事。

生以一個學年的時間，進行實際的論文探究。歷年皆分組由不同教授帶領，每組二十位學生，擔任這門課的教授幾年下來，我發現一些教學上重複的困頓，包括學生對於專題研究主題的選擇感到困難，有的甚至隨便複製他人應付了事，以及學生難以跳脫知識生產的刻板想像。

幾年以來，我以為自己在這門課中，很努力的實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由是：這是他/她們的研究，他/她們應當自己選擇要研究什麼以及要怎麼研究，一個指導教授的陪伴似乎不應當有太多的介入。但是，我卻在每年困頓的發現自己似乎是一個效能有限的老師，因為不管我如何的企圖引導學生思考：「教育研究必須跟自己有關係、教育研究必須挑戰主流文化價值、教育研究可以是一個增權賦能的工作」等信念，大部分的學生依然選擇自己所習以為常對於學術研究的想像，因為從他/她們進入這所名為師資培育的機構後，不管是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中，整個教育學術界以及實務界無所不在的實證、工具理性至上的思維與論述，早已經將學生打造成為盲目相信教育知識是客觀、價值中立的信徒，換句話說，他/她們不大有機會去學習看見自己所習以為常的教育知識原來反映父權中心、漢人中心、中產階級、異性戀中心，因此用相同的模式生產知識，充其量也只有複製這樣的偏頗。

從學生的知識社會化過程中，在不曾有機會看見知識生產跟自身的存在緊密關連前，早就內化一套實證主義的知識生產信念，知識客觀於自己的存在，對於什麼是值得研究的主題，也有相當客觀自外於自己的想像，尋找主題的時候，也很容易落入跟自己沒有切身關係的面向。對大部分的學生而言，尋找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主題，其實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對什麼感興趣，或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可以如何轉化成一個可以進一步探究的主題，沒有信心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可以是教育學術上重要的議題，每一年我也都看到幾個事不甘己的學生，一再的展現自己跟學習疏離的例子，這樣的學生當然不是只有在這門課才展現疏離，因此引導的過程常常出現辛苦的困頓。

此外，整個教育專題研究最後的呈現結果，不管是在研究內容上或在書寫形式上，也經常出現學術界習以為常的「研究者與自己的研究疏離、異化」的現象，也就是說雖然自己掛名研究者，卻不覺得自己這個報告跟自己有什麼關係，它就是一個要趕完的作業，其中沒有太多個人的感覺，甚至連書寫用語本身都極端的客觀，以「研究者」、「筆者」代替，大部分情況下，整個所謂的文獻探討甚至是大量的反映「複製、貼上」的電腦書寫文化，極少點出自己在不同文獻中斷章取義抄錄的段落跟自己手邊

的這個研究，究竟有什麼關聯，比較積極的學生就是複製了許多實證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表面格式，比較消極被動的則是靠著分組寄生在同組同學的作業中企圖蒙混過關。

書寫這些其實不在責難或是貶低學生，而是企圖點出師生共同的困境。這幾年隨著國家的師資培育政策、師院教學文化、師資市場等結構性的問題，在在讓學生對於前途感到無力，對自己有什麼專長懷疑，許多師院生因此習得無助，對於學習表現疏離，雖然我努力的同理與同情，也意圖以熱情感染學生，但是，看清楚自己卡在個人難以獨立撼動的教育結構中，不免也會愧疚自己形同將學生陷在這種學習無力感的共犯結構。因為理解自己身處的脈絡，任何企圖改變提升學習熱情的行動，不免也都是身為師資培育者自我救贖的一種希望。

因為不滿意這樣的存在，我每年都在想要如何根本改變，讓教育專題研究可以是學生積極主動展現學習熱情、重建多元意義的地方。從自己的性別意識越來越覺醒，以及越來越看見台灣社會存在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的急迫性後，最近幾年，我在不同的課程中皆企圖鼓勵學生，從教育知識生產與實踐的過程中，思考知識生產跟成就台灣作為一個公義社會的關係。這樣的企圖並不是一件容易成就的工程，我必須經常面對的難題是：如果學生停留在擁抱習以為常的父權文化，對於知識的想像停留在獨尊男流、實證主義以及工具理性思維，一個教授可以如何帶領學生進入實踐多元文化女性主義的知識生產呢？

在思考可以如何改變的過程中，我也經常看見自己好比走了一個鋼索上。當我要在教學上進行根本改變時，我發現自己被迫要去重新定義「尊重學生主體選擇」的信念。我可以如何在尊重學生中心的教學信念下，又能夠引導學生選擇一個多元文化教育知識的生產位置呢？一個相信民主的老師，可以如何不將自己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信仰，「灌輸」到相信「主流文化沒什麼不好」的學生身上？這樣的焦慮，如實的出現在我的專業生命現場。

2004 年夏天，當我閱讀到一位美國的女性主義教師 Judy Logan (Logan, 1997) 如何在小學教室現場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識生產後，我看見一個前進的方向。在這個結合藝術與女性歷史的教學中，Judy Logan 自陳受到美國婦女研究的學者 Peggy McIntosh 的理論影響。Peggy McIntosh 任教於衛思理學院婦女研究中心，同時也是美

國 SEED (Seek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Diversity) 的創始人⁴。SEED 志在經由教育的力量，成就平等與多元的社會理想。

在感動之餘，我開始利用暑假深入閱讀，思考可以如何克服自己過去在尊重學生自己選主題時，卻往往跟著學生受困於複製實證主義以及在客觀表象下再製男流知識的教學困境，我努力的思考可以如何更有效的引導整個專題研究的走向，作一點實驗創新，清楚的帶領學生直接體驗「研究的目的可以生產出有多元文化教育意涵的知識」。暑假過後，我益加確定要以更「堅定、前導的」(assertive and proactive) 姿態，選擇一個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識生產位置，也就是 Peggy McIntosh 所言的「課程重新聚焦」，從引導學生探究日常生活當中偉大的女性生命史，進行整個專題研究。

參、行動中持續與反挫交手

在學系的課程規劃上，這些學生在大三時就已經參加過當時大四學生的論文發表，擔任聽眾，因此，對於這門必修課有既定的觀想。因此，開學第一次上課時，當我開始跟學生說明我想要在這一學年作一個翻轉改變的企圖時，我看見學生專注嚴肅的盯著我。帶了這些學生三年，自己有多少底限，什麼樣的論述，什麼樣的脾氣，學生早就摸得清清楚楚。我一直是努力鼓勵學生提出異見的人，也以行動教導學生對於

⁴ 2004 年 11 月 25-27 日，Peggy McIntosh 教授應台大婦女研究室的邀請，來台灣參加第一屆亞太地區性別平等教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發表論文分享她們如何經由 SEED 培訓教師，讓課程更具性別友善、多元文化與國際化。據 McIntosh 的主張，當教師要在課程中教導那些長期被忽略的弱勢族群的知識時，教師經歷幾種階段的變化。首先，課程中完全沒有或極少有女性、有色人種的內容，大家都視而不見；階段二，有人開始發現課程中忽略了這些少數族群的內容，因此，開始將這些少數族群中「非常優秀的他者」，添加進去主流的內容中，強調少數族群的模範、楷模的人物，但是，他們出現的方式卻又跟自己的族群格格不入，例如優秀的黑人不像一般黑人，偉大有成就的女性，距離一般女性相當遙遠。階段三，歷史學者想要將很多的女性和有色人種放入歷史中，但是卻找不到可放的人，除了那些一天到晚在抗議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階級歧視的社運份子，這些人了解系統性的壓迫，而且每個人都充滿憤怒。階段四，歷史或課程得以「重新聚焦」，讓日常生活成為中心，偉大的人再也不需要符應某種偉大的刻板行為，才能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人們所作的每件事都是歷史。

不合理的存在提出挑戰。因此，當我跟學生說明這些年教學的困頓，以及決定無法耗費時間陪伴或指導連學生自己都自覺疏離的專題，學生很專注聽講。

我開始跟學生概略說明這一學年我所預/欲見的教育專題研究，鎖定在採取一個多元文化教育知識的生產位置，以禮讚身邊的女性為題，聚焦在一個自己所尊敬的女性，進一步深入探究她的生命經驗，進而呈現以女人為主角的知識敘說。我先說明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的學理根據，以及提高平凡女性生命知識能見度的企圖，並學習以不同的形式呈現研究成果。當時我跟學生討論到音樂、表演、繪畫、拼布、雕刻等等，都可以是知識的呈現方式，基於拼布是比較容易學習、生產，材料也容易駕馭，因此我預計同時效法 Judy Logan 的拼布教學方案，作為呈現教育知識的另一種方式，所以，我先預告這一組的學生會比其他三組的同學辛苦，除了書寫文字報告，還要用拼布方式來呈現自己的研究結果，體認知識呈現的不同形式。我也跟學生說明，我會往外尋找一位拼布老師來教導大家，最後再把全班每個人個別的拼布，拼成一大塊主題拼布，好像一本論文集一樣。提到拼布作為另外一種知識呈現的方式時，我注意到有些女學生的眼睛發亮，也有人一直皺眉頭，說明學生專注的在聽課。

當時，我其實不確定這樣的規劃，學生會願意走到哪裡，因為畢業班的學生總有許多要去完成的其他工作，例如畢業旅行、教育實習、實習運動會等，但是，課程方向一旦明說，我深知：在引導研究期間，除了陪伴，我也必須嚐試克服困難與學習耐心等待。第一堂課結束前，我誠懇的跟學生喊話，如果學生可以接受這樣的規劃，我們一起努力，如果不符期待，我建議學生轉到別組。同時，我請學生回去思考我所規劃的課程方向，包括選擇一個自己所尊敬的女性報導人選，以及思索：為什麼選擇這個人來當做自己的研究報導人？她為什麼值得我們投入整學期的力氣來深入認識，以及禮讚？

第二堂課，當我開始詢問學生心中的理想報導人選時，大部分的人第一個想到媽媽，有人的理由是「她就在我們身邊，我們把她當作理所當然的存在，卻很少了解：她是誰？她有什麼想法？她可能有什麼偉大的知識？」因此，母親成為一個研究人選。當然，我也清楚的知道：選擇母親其實也極有可能是方便選樣，以避開研究陌生人時可能出現的麻煩。有些人選擇其他親人或朋友，包括小時後生病去看的醫生、學校的師長、親戚、或外面認識的職業婦女、家庭主婦。

就像簡單物理學定律，任何作用力就會有一個反作用力，過去幾年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的經驗，讓我預計這個想要提高台灣女性能見度的專題計畫行動，勢必會遭遇某

些阻力，啟動某些反彈的行動，我只是不清楚阻力會以什麼樣的姿態展現，以及來源何在。

一、爲什麼要寫女性的故事？

第一個出場的反挫是，有一位男學生在課堂上公開質疑「爲什麼要寫女性的故事？」這位男學生非常猶豫要進行這樣的探究，他似乎很無奈的坐在這堂課，當我蓄意邀請他回饋時，他的問題是：「爲什麼要寫女性的故事？我想要寫我的父親啊。」他的理由是，父親近乎聽障，他想要了解父親的生命經驗。我因爲之前已經說明整個專題的基調，就是生產有關女性生命知識以提高女性能見度，面對他的質疑，我又再解釋一遍，然後反問他「一個聽障人的妻子以及子女的母親，可不可能成爲你的關注焦點呢？」他沉默了。從過去在性別教育課程跟各種學生接觸的經驗，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沒有說服他。

他讓我在初期確實感到相當大的挑戰。正因爲了解自己掌握著定義課程方向以及評量分數等等的權力，我很高興他願意公開提出質疑，因爲這個質疑、主動協商課程的動作，多少說明這還是一個安全的教室，他可以以及敢於公開質疑，而不是選擇沉默，卻又私底下不爽。由於經常苦思如何避免濫用權力，因此讓我不時分裂成不同的靈魂，兩端拉扯，一個說「就讓他去研究他要的主題吧」，另一個我卻說「堅持下去，他才會有機會看見他該學習的知識。」後者也讓我看見自己心中的威權，努力的在維護教師的專業權威，相信當學生偏食，教師有責任教導他健康營養的知識，這是教師的道德責任。一個老師究竟該怎麼做呢？

幾週下來，都沒有看到他任何積極的進展，如果不是缺席，就是說他還在想，當同班同學已經開始進行初步的訪談，甚至在課堂上分享有趣的發現時，他的消極不合作主義，讓他的進度落後同學一大截。有一次他再度缺席，讓我很懊惱，一方面是不滿意他翹課，讓他無法從同班同學互相學習訪談研究過程中的注意事項，一方面也覺得自己應當要直接針對他的進展面質他。課後我改以電子郵件直接明白的告訴他：如果對於這個主題不感興趣，我「真的」鼓勵他換組，我願意替他找其他組的老師商量，不要再蹉跎了。如果不換組，我就挑戰他思考：爲什麼我們會認爲身邊都沒有一個值得自己尊敬禮讚的女性？是因爲我們的學校學習過程中，讓我們看不見？還是，我們有機會卻不想要去看見？我們會不會太理所當然的忽略了身邊女性對於我們以及這個社會的貢獻呢？如果身邊找不到一個可以讓我們尊敬禮讚的女性，這究竟在說明什

麼？還是說我們已經如此習慣將「偉大」跟女性絕緣？

跟這些學生相處三年來，我很少在課堂上說重話，正因為了解自己掌握著極大的權力，因此，發完信後，我其實有點擔心打擊了學生的自信心。衡量後，他不要換組上課，他說他一直在想要訪談他擔任課輔義工的學生的阿嬤，因為這位很窮的原住民阿嬤獨立撫養被家人近乎棄養的外孫，他覺得這個阿嬤還蠻不容易的。鎖定報導人後，一開始前幾個星期，他顯然遇到很大的困境，例如他不會聽、也不會說原住民語言，無法深入訪談，另外時間安排不易，阿嬤經常要回部落去照顧家人，最後他只好放棄，再找一個報導人。我知道他仍在質疑研究書寫女性的意義，當他迫於時間，回頭來書寫自己的母親時，他仍然質疑，「雖然我很尊敬我的母親，但是她是這麼平凡，好像對社會沒有什麼特別偉大的貢獻。」

雖然起跑時因為抗拒拖延，明顯的落後其他同學，也讓他比其他同學更主動積極的思索這個研究跟自己的關係，學年結束時，他的學習是深刻的，他在期末報告對整個過程賦予如下的意義：

研究之初，我對於寫一個女性的生命史原本覺得不必要，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寫女性，相似度會很高，所以我想要寫一位男性的生命史，經由老師勸導而寫一位女性的生命史。然而，在我蒐集文獻資料的時候，我才發現女性生命史或是傳記的數量遠比男性少得多，而偉大的女人真的比偉大的男人少太多了！女性真的是那麼不值一提嗎？因此，我開始意識到這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其迫切性。

從認識自己母親的生命經驗中，他也發現社會結構對於女性的諸多限制：

在這份研究接近尾聲時，我發現母親的生命故事裡有著許多意義，她讓我看見一位平凡女性被社會結構的框架給限制住，而無法隨心所欲。社會結構的框架對女人真是可怕的層層枷鎖，在母親的生命故事裡，它限制了女生的求學機會，讓她的受教權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它讓長女得承受沉重的家庭負擔，讓長女得犧牲更多，別人才會誇她懂事；它讓女店員被性騷擾之後，還要擔心受怕，甚至辭了工作；它期望母親要犧牲工作去照顧家庭，導致女人二度就業的困難與辛酸。社會結構的框架都是在男性為主的社會所形成的意識型態，它限制住了大眾的思想，更束縛了女性的生命發展的可能，我們不該讓

同樣的錯誤再繼續發生，因此藉由這份研究改變錯誤的社會結構是必要的。這份研究使我能盡點心力為女性發聲，讓我看到不公平的社會結構，是我做此份研究最大的收穫。

二、爸爸不讓我寫媽媽的故事！

第二種反挫來自女性報導人身邊的男性「抗拒」這個研究的必要性。當學生在課堂上分享這樣的抗拒反應時，我剛好可以具體的說明研究與書寫的政治性。決定書寫自己母親的過往生命經驗，其實是一個非常政治的行動，它迫使研究者要去面對家庭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自己的母親如何訴說這個婚姻，以及父母的婚姻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要攤開在陽光下，接受為人子女的檢驗，因此，動搖了一個原本看起來穩定的家庭人際關係，每個家庭都有自己避諱的議題，訪談母親的生命極有可能觸動到某些敏感的議題，例如孩子從小看著父母親之間的感情關係，早就發展出某種難以言說、不可言說的理解，當他/她們決定書寫自己的母親時，勢必要去處理這個微妙的議題。原本學生認為選擇母親作為報導人很方便，但是，她們也馬上就看見要去觸碰家中隱諱議題的困境。

因此，一開始就篤定要書寫自己母親的女學生，清楚發現自己必須面對一種來自攪動這種關係所帶來的反挫。有的女學生提到，訪談開始，父親對於她的研究方向有意見，為什麼要這麼麻煩，隨便瞎掰就好了，教授也不會知道呀；一位女學生提及「在這個研究過程中，我所遭到的最大困難來自爸爸，因為我爸一直覺得「當時的人都這樣生活，沒有什麼問題阿，有什麼好問的！」當我在訪談媽媽時，他總是會突然冒出來，一下要我媽煮飯、一下要我媽打電話聯絡工人」，女學生在課堂分享父親技術性的杯葛，雖然換來全班的大笑，但是我也因此有機會進一步指出類似論述所展現的權力與知識的意義，明示/暗示他不認為這個探究有什麼重要，或是質疑女人的生命經驗「值得稱為知識」；另一位甚至粗暴的要求自己的女兒換一個題目，直接的說「妳媽媽的故事有什麼好寫的？」。

親近的父親，不管是開玩笑，或是嚴肅的貶低、否定女兒所要探究「女性」的生命故事，其實都是如此自然的展現這個社會不認為女性有什麼重要或偉大的思維，他們不在知識生產的學界，可是，他們企圖阻擋生產女人知識的行動，跟學界所生產出來的知識當中對於女性刻意的空白、忽略、或扭曲，其實是異曲同工，他們的阻撓體現家庭當中的性別政治，家中掌權的男性定義什麼才是重要的，什麼才是值得書寫的

作業。一位女學生反問，如果一個女兒說她要寫父親的故事，家中的女人會去阻擋嗎？答案很可能是不會，那這又說明什麼呢？類似的故事說明的是：原來女性所受到的排擠，不只是在生存的空間，也在書寫及研究的領域（陳玉玲，1998，頁 1）

在這樣的時刻，我只能故做鎮靜的跟女學生說，妳們要自己做決定，看要如何解決卡在其中的困頓，要跟隨自己的心，書寫媽媽，還是要臣服於父親的反對？或是可以如何兩全其美，跟隨自己的心，又能夠說服父親？我永遠記得那個緊咬雙唇，淚水在眼框打轉的女學生，委婉的跟我提及她可能要換報導人選，因為她打電話回家說到要研究媽媽，卻被爸爸在電話中潑了一大盆冷水。我同理她的困頓，並引導她澄清自己：「換報導人沒有問題，而是妳要如何對這個探究賦予意義，以及對妳個人而言，書寫任何一位女性對妳的意義是什麼，這才是你自己要去想清楚的。」當她含著眼淚，眼神直直的看着我說：「我再想想」，我就知道她不會背棄自己最初的決定。

這樣的阻力讓她更主動積極的投入學習，聰明的她，努力的運用策略，達到她想要進一步認識媽媽生命史的研究目的。她做了許多準備，讓父親以為她也同時在撰寫父親的生命史，她「選擇以撰寫父親生命史的方式提問，先讓父親說出自己的故事，再從談話中無形拉出與報導人（母親）之間的關係，算是有點旁敲側引的感覺。」雖然花了許多時間與精力，這位女學生成功的破除了障礙，克服來自父親的阻力，也讓她得以有機會看到父親柔性的一面，同時對於報導人所陳述的資料獲得進一步的證實。

三、連女性報導人都不覺得自己值得被書寫

第三個反控是，從學生在課堂上或是個別討論時分享的訪談經驗中發現：許多時候，連女性報導人都不覺得自己值得被書寫。令人遺憾的一個例子是，一位女學生興趣很高的想要以她從小景仰的小兒科醫師為報導人，因為五十多歲的女醫師，確實在台灣是不多見的存在，她透過家中的長輩跟這位醫師搭上線，醫師也同意，但是，基於某些無法獲知的理由，這位醫師顯然不認為自己的生命故事有什麼重要的，這位女學生敏感察覺醫師在訪談時，對於過去某些求學或擔任醫師的經驗「語帶保留」，加上在訪談過程中，「她執意要我利用她在醫院上班的時間做訪談，她不太願意再另外撥時間來進行這項工作；況且在看病的同時，不斷有病人會打斷我們正在進行的訪談，就連旁邊的護士小姐聽到我們在談話的內容，也會不時的加入討論，造成這樣的工作更難進行了。」在時間壓力下，她被迫轉換報導人，我們因此沒有機會透過這一

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的角度，進一步理解早期女性在醫學教育以及職場中的性別經驗。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勞工階級的女性報導人的身上，她們很客氣、委婉的懷疑「我的故事有什麼重要的？」或是不習慣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成為關注的焦點，因此受寵若驚。一位男學生寫到：「在與母親對話訪談的過程中，母親一開始總是認為自己的生命經驗是那麼的不具報導性，甚至說：「去訪談你爸爸，他的故事比較精采！」」。

女性報導人因為不習慣被當真對待，不習慣成為主角，有時候在面對學生的訪談問題時，當場無法自在的回答，甚至會答非所問。訪談之初，也往往出現報導人身邊的男性基於好奇或是習慣，會跟在旁邊看看研究者到底要問什麼問題，學生也發現這些男性甚至不請自來的直接替女性報導人回答，男性如此自然的認為自己可以替女人發言的現象，一再的在這個班級的不同個案中出現。

這種微妙的反挫讓學生對於資料的收集更是嚴肅以待，更加持續的跟報導人接觸，耐心的傾聽，她/他們漸漸發現，幾次的訪談下來，只要給予機會，這些年紀從三十幾到八十幾的女性報導人往往可以侃侃而談自己的生命過往，分享她們對於世界的觀想，學生因此得以跟著這些不同年紀、職業、階級、種族、婚姻狀態的台灣女性，進入不同時空的台灣社會角落，學習認識她們對於家庭與社會源源不斷的貢獻與從生命中所淬練出的知識，甚至連報導人都發現原來自己走過這樣的歲月，自己也可以是有價值的，研究訪談成為一種增權賦能的過程與結果，這是展現女性主義研究倫理具體的例證⁵。一位男學生說：「隨著訪談的進行，母親漸漸的開始回到過去。當論及快樂的生命經驗時，母親就好像回到過去的感覺，以愉悅的口吻與表情描述著記憶中的情境，而當論及塵封已久不願碰觸的記憶時，母親也開始嘗試回憶。就在這些記憶重新載入母親腦海時，母親其實也在思考自己故事的價值，發現自己其實並非如自己所想像的如此微不足道；母親重新認識了自己，同時也察覺自己生命的價值。」

⁵ 研究不應當只是成就了研究者，而是對於協助研究者獲得所有研究資料的「研究參與人」或者是實證研究所說的「研究對象」，也能提供機會讓她/他們也可以感受到力量，這就是一種倫理。強暴式的研究，或者是打了就跑的研究，都不是一個追求平等理念的教育工作者所應當做的研究方式。

肆、行動中：第一女主角，妳沒有名字！

上學期的期末，學生先行以書面報告的方式，繳交一個學期初步的研究結果。在閱讀學生的作業時，我發現到全班十九位學生的作業中，女性雖然是第一女主角，大部分的女性報導人卻是無名的，她們被研究者隱身在不同的角色中，是媽媽、奶奶、舅媽、太太、或阿姨。這些同學連報導人的名字都沒有書寫，並不是爲了匿名，而是她/他們將之忽略了。當我正在懊惱這種將女性埋名的知識複製時，獨獨卻看到一位男學生直接在論文題目上寫：「看見范桂香，你不認識她，她很偉大。」⁶讓我在辦公室哈哈大笑，這一個蓄意的行動，在最醒目的地方，劃記女性報導人的名字，明白宣稱「范桂香」的存在，讓人要遺忘都難。

下學期第一次上課時，我很明白的指認「第一女主角無名」的現象，企圖引導學生思考：如果寫爸爸，會不會習慣性的第一個就寫他的大名？我以自己的多重身分跟學生說，「我也許是李媽媽、李太太、李師母，但是我也是有名字的，叫做蕭昭君！這種忽略與不見，跟族譜當中女性沒有名字其實是一樣的道理。請不要叫我蕭氏！」也許是我的語言表情太誇張了，好幾個學生都不好意思笑出來，學年結束時的總報告，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清楚的爲自己的女性報導人正名。一位女學生在最後的論文中也特別提到，這個研究讓她有意識的看見女性的稱謂，跟她能不能產生主體認同是有關聯的：

「母親，習慣她的名字是不見的。嫁給父親之後，很多的場合需要簽名，小至學校的聯絡簿，大至婚喪喜慶的簽名，母親都不曾寫下自己的名字。母親習慣是無名的。她認為自己是在父親地位之下的。慢慢的母親漸漸的看到自己的價值，並不是只是一位陳太太的角色，也是一位古小姐。這樣的轉變是在母親外出擔任看護時，漸漸有的覺醒。這也是我透過這幾年的觀察，發覺到母親意識到自己的地位並不是在父親或者是這個家庭的附加物了。」

除了無名，學生的初步發現中，也清楚的描繪出父權文化系統性的性別歧視。十九個人的集體報告，說的雖然是個別女性在不同時空的故事，不同家庭、不同種族、不同階級出身，但是她們卻共同訴說女性在生命的不同階段，被迫處在系統性的暴力

⁶ 經由原著學生同意引用范桂香的名字。

對待中。小時候，身為女兒，所以被出養、忽略，所以要忍耐家暴，所以要犧牲、付出，所以要成就家裡與栽培兄弟；及長，身為妻子，所以要成就丈夫與孩子，所以要忍耐婚暴。所有的「所以」，成為女性內化父權壓迫的理所當然，她們也這樣的教養下一代的女兒與孫女，父權文化透過女性，邪惡的企圖完成再製的使命。有兩位女學生在各自的報告中都點到，她們看到自己的媽媽如何在婚姻中失掉自我，如何處在性別權力的弱勢地位，或是面對婚暴，如何委屈求全，她們知道母親的苦，看見家庭當中權力不對等的性別政治，回頭反身，卻猛然具體的發現自己在跟男朋友的關係中，也在複製不平等的性別權力關係，也在重蹈媽媽的腳步。尚未走入婚姻，她們因此得以對於自己委曲求全的性別關係有所反省。

以 MY 為例，從瞭解母親的生命故事中，反身回看卻看見自己跟母親是如此的相像，才發現文化影響人的力量不可小看，她說：

「在這份報告中，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態度與母親是一個複製過程，這個結果讓我非常激動，母親曾經說過一句話「沒有我，妳爸爸怎麼可能撐到今天，他幾兩重我清清楚楚，像我做事情這麼勤勞的人，現在沒幾個了！」這句話表面聽起來是說明一個女人的幹勁與能力，但是換個角度想，這宣告女性的處境是輔佐男性，而且這是值得讚揚並以此為榮！我覺察自己的想法，其實自己內心也是這種思想，只是母親的這句話重重點醒我，這項發現令我很困擾也不知所措，因為我時常也會認為某些事情還是我自己做比較好，異性一定沒辦法完成。原本這份報告是希望藉此喚起女性在自己生命故事中看見應該受到解放的心靈，但是當我知道其實自己就是一個待被解放的個體時，我開始徬徨、害怕，因為做了許多紀錄分析，但是到最後才發現我也是父權體制下的支持者，原來在平常當我認為男性不能做某些事或女性能做某些事的時候，還有與異性相處時我時常習慣做家事勞務工作例如洗衣服、煮飯等工作，就在當下我增強不平等的性別對待，內心覺得很諷刺，不過很慶幸的也因為這份報告，我才能更深刻檢視自己的思想。」

也就在這裡，作為指導教授和第一讀者的我，有一個最適切的位置，進行「女性主義的介入」。我總是希望讓她們知道，她們本身的存在就是最重要的，不需要依附在一個男人之下，看見年輕的姊妹，選擇一個跟母親相同命運的道路，忍耐、縱容暴力，讓人心疼。我努力引導女學生看見，我們的母親們，用她們的生命，企圖成就她們的女兒有更好、更有尊嚴的生命，我們絕對必須認真對待自己；如果男朋友不知道珍惜我們，為什麼要委屈自己，讓自己成為迫害自己的共犯呢？女學生可以如何在愛

情關係中保有自我呢？當然，我不是她們，我不會知道她們未來會如何決定跳脫自己因為這個探究所看見的困頓。我只能期待：這個生產女性知識的探究過程，以及其中所獲得的學習，如果有力量，就會在生命重要的關卡引導她們。雖然，隱隱之中我不安的思索，知識可以如何更貼近行動？她們可以如何行動，捍衛自己的「主體」？

伍、行動中：以拼布作為知識的另一種再現

當學生做完大部分的資料收集後，我們進入專題研究的第二階段，學生學習創意發想，設計圖樣，將自己叙說的故事，以拼布藝術形式表現，一針一針的縫出所書寫的故事，企圖落實知識的多元呈現形式。為了完成這個目的，我事先跟一位同事潘小雪教授討論我的構想，小雪是一位非常投入社會運動的藝術家兼策展人，她相當肯定我的構想。小雪老師的二姐潘旦雲就是一位拼布老師，與潘旦雲老師多次討論後，我數度帶領學生到她的拼布專櫃，學習如何做拼布。從三月初開始的第一次拼布教學，學生進行創意發想、修正設計圖、找材料、學習特殊縫法、再一針一針的縫出自己的故事，期間大約兩個月。五月初完成個別拼布後，我跟全班將所有的二十塊拼布（包括我那一塊有關女性癌症病友生命故事的拼布⁷）集合起來，一起進行大拼布的拼圖。由於學生忙著畢業前的諸多工作，不容易找到時間一起縫製大拼圖，我只好另找援手，延聘一位朋友的越籍幫傭阮氏紅，協助我將二十塊小拼布接成大拼布。因為阿紅的及時協助，這塊長 190 公分、寬 155 公分的「禮讚台灣的女性」的大拼布，得以順利完成。五月底，這塊大拼布終於如期的懸掛在學生的論文發表會場，參與這個專題的學生與聽眾都很興奮的跟它合照。六月畢業典禮前，這塊大拼布（如下頁圖），也正式掛在圖書館大廳的牆壁上，成為圖書館的館藏。

⁷ 學生在進行專題研究期間，我也進行一個女性癌症病友的生命故事研究，在韓國首爾舉行的 2005 世界婦女會議中發表。Who needs feminist education in Taiwan? Lessons from female cancer patients' lived experiences. Paper presented in Women's Worlds 2005.^{9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n Women. Embracing the earth: east-west/ north-south. Seoul, South Korea. June 19-24,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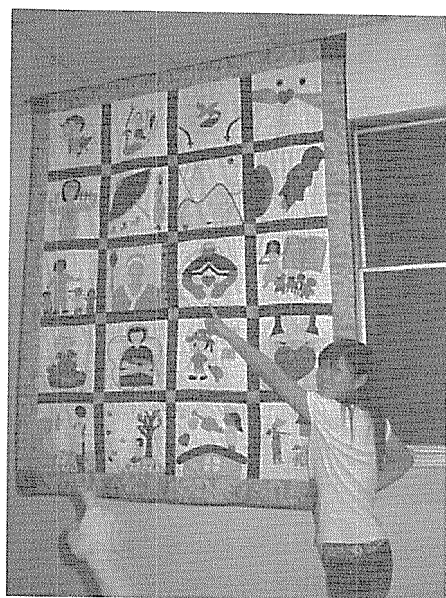


圖 1 「禮讚台灣的女性」拼布

在生產拼布的過程中，大部分的學生，都很能清楚的用令人動容的圖像，呈現女性報導人生命故事中的精髓。例如一位男學生寫道：「拼布作品即是母親與我最好的說明；中心的桂花代表著母親一桂香，母親懷中的孩子則代表我，以母親臂膀圍繞起來的內圓是母親對我的包容與關懷，臂膀的外圓則是母親的堅強及對我的呵護，至於身旁的利刃則是母親面對的所有艱辛及威脅，然這些困境母親全都用自己的臂膀承受，讓我在溫暖的臂膀裡成長，感受不到一絲一毫的威脅及艱辛。」這位男學生在研究中訴說因為父親欠下賭債，名為范桂香的母親如何帶著年幼的他，深夜逃離，避開母子被黑道追殺的命運。

另一位女學生書寫自己五十多歲的母親在重男輕女的文化下，兒時被出養、惡待的生命經驗。她提到自己如何從文獻閱讀中找到反映自己的故事設計圖的構想，她指出：一開始構想拼布的呈現十分的不容易，如何利用圖案在僅僅三十公分長的正方形中敘述母親 j j j 的故事，我思考了三天，但卻遲遲不敢下手，因為我一直在腦海中繪想出無數的拼布圖案，但卻無法說服自己這就是母親的故事，直到我看見曾秋美所著的『台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所敘述傳統社會中媳婦仔的類型，且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習俗產生，我才知道所謂的『磧花媳婦仔』，馬上我腦海中就浮現出一位生長在鄉下農村的小女孩，她靠著缺乏充足養分的樹木，望著遙遠的遠方，她不願展現心中的感受及情緒，只是默默的坐著、等待著什麼到來似的，而那樹枝上因為缺乏照顧無法生長任何的樹葉，但她卻靠著自己長出一顆顆的愛心，並飄向她所望的遠方。這個畫面中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媽媽—jjj，而樹木是要呈現母親是『磧花媳婦仔』，因為她缺乏親人的關懷及照顧，所以自己缺乏自信、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但她卻充滿了對每個家人的關心及愛護，由於她總是將心事、淚水往肚裡吞，不願身邊的人為她擔心，所以她隱藏了自己的表情，不希望大家看到自己虛弱的一面。」

學生真的看見知識可以用除了文字以外的不同形式展現嗎？一位女學生在論文中回看這個經驗後寫道：「我以拼布縫製的方式，將我母親生命中最重要、最精華的事件及精神，加以具象化成一份拼布。我們一組二十人（包含指導教授），都一針一線的縫出代表我們報導人的拼布，讓這些故事不只是透過文字呈現，藉由布料顏色及構圖、一針一線的縫工，向人們展示這些女性偉大的生命故事，比起大量的文字，拼布也許是更直接、更容易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它可以馬上讓你看到這位女性生命最重要的精神、事件或概念，是很特別的一種知識呈現方式。」

另一位女學生則進一步的指出，拼布作為一種知識呈現的方式，提供一種認識與思考改善女性處境的機會，她反省道：「在縫製拼布的過程中，其實感觸蠻多的，一針一線把一個生命故事的精華完全呈現的感覺，非常的特別。我想，也許有很多人開始致力於女性發聲、書寫女性等等工作，但以拼布呈現，是非常與眾不同的方式，也容易令人關注到這些女性，觀看者或者會開始猜想：何以這塊拼布要這樣呈現？它背後的故事是什麼？如此便給了這些女性最好的發聲管道，有人願意去發問、去探究、去理解、去體會，相信對女性的處境將有所改善。」

陸：行動中：召喚更多人看見平凡女性的偉大

在畢業班將這一年教育專題研究成果公開發表的當天，十九個學生，每個人都用十五分鐘的時間，站在大拼布前面，訴說台灣不同時空角落的女人，如何努力生活的故事，以分享自己的研究發現，並說明屬於自己的那一塊拼布的意涵。我看見學生非常有自信的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這種自信來自於對於主題的深刻理解，以及對於自

已作為研究者，跟這個研究產生切身的連結。當其他組的同學，以一個上午的時間，就結束了論文發表的工作後，我們這一組的學生則延續到下午四點才結束，上午的聽眾雖然是初教系硬性規定一定要參加的大三學生，下午則看到一些早上在別組的聽眾，自己跑來這一組當聽眾，讓我覺得最高興的是，整天的發表中，都有大三的聽眾主動的發言問問題以及回應論文發表人，再度看見故事敘說的召喚力量。

坐在台下，聽著學生訴說這十九個女性的故事，其實是情緒非常激動的經驗。雖然我沒有機會親自認識每一個報導人姊妹，經由學生的分享，我得以有機會進入她們的故事中，了解她們豐富多元的生命知識，因為她們在不同時代、不同角落，這樣的認真生活，突破各種因為是女性所帶來的生命困境，其中有寡婦、離婚、單親的母親，有婚姻幸福的、有先生外遇的、有遭遇婚暴的妻子，有養女、遭遇家暴的女兒，有在工作職場遭遇性騷擾與性別歧視的職業婦女，有遭遇到社會逼婚的單身女性；有不同族群的女性，客家、河洛人、原住民；有勞工階級女性、中產階級的女性；有三十多歲的職業婦女、也有八十多歲的阿嬤；有身體嚴重肢障的、有癌症往生的、有身體健康的。不同家庭出身，表面上讓這些女性因此有非常不一樣的生命經驗，但是，大家活在一個共同的父權文化森林下，因此，十九個故事清楚的展現代表成千上萬跟她們類似生命遭遇的女性，她們的故事，提供一個深入了解父權文化的窗口，讓我們有機會正眼凝視父權文化對於女性與男性的壓迫，以及正眼看見女性在面臨各種困頓中所展現豐富的主體生命力。

柒：行動後：重新觀想在地女性主義知識的生產

當課程結束，看著掛在圖書館的禮讚台灣女性拼布圖，作為一個關切性別平等的師資培育者，這一切究竟有什麼學術實踐上的意義呢？從建構在地的女性主義教育學知識的企圖出發，我提出三點發現。第一，帶領學生進入有關在地女性知識的生產工作，不只是可以實踐的教育施為，也是關切多元文化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必須繼續努力的方向。教育工作者重要的工作是「為學生開創挑戰主流文化的機會」，原本以為是在提供學生機會打開視野，最終教育工作者也因此擴大視野。

在這個探究過程中，我經由學生「深入認識或重新認識」身邊不起眼的女性，接觸過去不曾進入的女性生命知識領域，進一步瞭解屬於勞動階層的當代女性集體的生

命知識，見證女人豐富的生命知識與認真面對生命挑戰的能力；這個看見讓我對於性別與階級交織的體驗益發深刻。這些女性報導人，終其一生都在勞動中生存，擔任各種勞力工作：工廠女工、水泥工、養蜜蜂、特別看護、油漆工、種田、開餐館，在婚前婚後，皆是家裡重要的勞力來源，但是，女性的貢獻被視為理所當然，極少被認可，更少被瞭解、讚揚；許多女性出生時不被期待，被嘲諷，甚至被出養或棄養，也理所當然的被犧牲，以將家中有限的資源保留給家中的男孩。及長，就業的女性，面臨職場的性騷擾與性別歧視，未婚的女性面臨社會逼婚的壓力，已婚女性的命運，繫於有無嫁對丈夫，外遇、打老婆、限制老婆的行為，在這個課程的不同報告中，竟然此起彼落，讓我更清楚的看見婚暴與家暴如此切身、普遍，也益加肯定：女性的弱勢處境，不是存在遙遠的過去，而是真實存在當代這些介於三十到八十幾歲的女性生命當中。

換句話說，我們看見、聽見這些平凡女性不同的生命經驗，揭開個別故事背後清楚的共同文化結構，如何成為壓迫女性集體的存在，以及記錄見證不同的女人如何發展努力面對生命的能量，經由訪談、思考、書寫的知識生產過程，準老師因此益加確認台灣女性的地位仍然有待大力提升，也有機會對比不同時空下的自己與其他平凡女性的生命經驗，思索年輕一代的女性可以如何跳脫、轉化前一輩母親/祖母附屬的命運，進一步與如何實踐性別平等教育扣連，與這一門課原先期待這是一個為女人而研究（for women）的目標相符，她關心女性的遭遇，想要從深刻的認識女性的生命中，企圖思考現在以及未來可以如何透過教育的過程，改善女人的不利處境。從教學者的角度出發，對於在地的女性生命經驗更貼近理解的知識，協助我在未來的教學中可以更有力量轉化西方女性主義的觀點。

第二、挑戰男流為尊的既定知識想像，確實有待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者持續著力。為了活化教育專業知識以及成就社會正義，教育工作者必須努力更貼近文化現場，挑戰主流教育知識的生產，注入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識生產視野。這樣的改革必然會遭遇抗拒，不同教室脈絡、師生關係，影響抗拒以及反挫的走向，倡議多元文化或女性主義的教育工作者可以積極的轉化班級現場的抗拒，將之當作推動平權教育的教材進一步拆解。前述提及的出現在課程中的不同反挫現實，提供教育工作者最具體的例證，引導學生體會權力、性別與知識交織的文化現實，誠如劉美慧（2005）的發現，在教學的過程中，多元文化教育亟需努力的，「是在對抗優勢族群背後難以撼動的意識型態。」雖然，男學生或是女性報導人身邊的男性對於生產女性知識所展現的抗拒，可以如何更有策略的化解，是女性主義教育學必須持續努力的議題，然而，我也相信，

成就平等正義的教育是一種道德責任，因此，不管是對於性別平等價值明目張膽或是溫柔幽微的抗拒，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善用自己在教室的權力，引導學生看見自己在社會具備不同權力的相對位置：平等不會從天而降，弱勢族群要獲得知識的能見度，端賴有權力定義、生產知識的人願意反身自己不勞而獲的優勢。正如 Campbell(1993)所言，當我們以抵抗權力壓迫的立場參與論述時，我們即在一個對既有知識與經驗觀點進行改造與形成新主體的認知之過程（轉引自楊幸真，2001）。

第三、從知識生產的角度，女性主義的知識生產，讓研究者與研究參與人因為研究的過程而變得更有能量，避開傳統實証研究被詬病的研究者將研究對象客體化的剝削關係，成就了研究者，對研究參與人卻不必然有什麼好處。從學生的報告中，我清楚的看見兩者因為這個探究產生不同視野的力量。從報導人的角度，許多女性因此感受到自己的生命被了解與被認可，看見原來自己平凡的一生也可以是別人學習的對象，協助她們建立自我價值感。一位報導人很高興的跟自己的親戚說，她成為自己女兒的研究對象，要寫成研究報告，讓其他親戚也詢問自己就讀於其他師院的孩子為什麼不做這樣的作業。一位男同學選定的報導人是舅媽，因為他看到作為一位受刑人妻子的舅媽，如何的獨立帶著小孩，突破各種經濟困境，等待丈夫出獄，他原本以為舅舅是黑社會的大哥，因為這個探究，他才發現「舅舅沒有想像中壞。」

如前所述，從知識生產者的角度，她/他們經由這個探究機會，得以深刻認識不會在教科書中出現的平凡女性的偉大知識，了解在男流為尊的知識之外的多元面貌。這樣的學習，為她/他們帶來不一樣的「看見」，也促使她/他們有機會檢視：女性觀點不一定就是符合性別平等的觀點，這個社會仍然存在很多女人不自覺的接受或捍衛父權文化加諸女性的束縛，認為這就是女人的宿命。所幸，年輕的一代不必然認可這樣的文化安排，開始思考跳脫父權文化框架，看見自己可以追尋更有尊嚴的存在方式，例如女學生 MY 說：

「與母親的故事接觸半年多來，……我始終感到自己是幸福的，因為因此了解了一個不是屬於我的年代發生的事情，也知道一個女人在面對婚姻可能碰到的困境，從閱讀許多有關研究客家婦女的報告或文學描述中，裡面呈現的女性多半是整天忙碌於工作、家庭間，還有對丈夫體貼並且擔任家中經濟來源，這些在母親作為一位客家女性真實的經驗中得到印證。然而令我感到一陣心痛的是母親對於自己身為女人，認為女人天生要做這麼多事情，我可以體會為何母親會如此認為，因為在她生長環境中看見的女性都是這樣過日子，而且母親必須挑起經濟重擔，所以可以見得環境影響一個

人。從母親的敘述中我感受到一個女人的無奈，因為她的故事印證父權文化體制壓迫無所不在，回想我現在與異性的相處模式，有時也是呈現兩性差異，我似乎正在複製母親對我的影響……我相信自己可以變得更自主、更愛自己一些，因為母親的故事讓我了解自己可以選擇不一樣的生命。」

女人跟女人的關係，是女性主義論述中的重要議題，很多女人認可父權文化，持續成為男女不平等的幫凶，一位從小感受到男女不平等的學生，因為這個研究，瞭解母親重男輕女背後的文化脈絡，因為瞭解而諒解，FC 說：

「因為這一個研究，讓我知道媽媽的一些行為是受到影響才會形成今日的媽媽，我小時候，最常和媽媽激烈爭吵，因為我覺得媽媽嚴重偏心，對弟弟比較好，比較疼愛，其實媽媽會這樣也是受到外婆的影響，同時弟弟也可以說是她用生命換回來的，在生弟弟的時候脫腸，她差點性命不保，又是她期盼已久的兒子，所以對他會偏心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偏偏當時的我不懂事，只會一味的爭吵和抱怨，無形中不知道傷了媽媽的心多深多痛，這是在研究過程中，感到最虧欠媽媽的地方。」

諒解不表示她認可這樣的存在方式，她看到深入認識的力量，反身自己可以成為策動改變的主體：

「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不斷聽到媽媽或是爸爸會說一句話：「當時的人就是這樣阿！」所以我在描寫媽媽生命史的同時也是寫出那時候女性的普遍成長經驗，沒錯，人是生活在社會之中，是社會的演進歷史中一個小角色，可是有時候社會中的理所當然卻不見得完全正確，要修正整體大環境的觀念或許不容易，可是從我自己本身開始努力修正並不難，透過描寫媽媽的生命史，我可以不斷反思自己的行為，歷史之所以會不斷重演，就是因為後人沒有思索歷史中的問題，…藉由訪談我瞭解媽媽生命中的喜和悲，同時也驚覺我無形中受到媽媽挺多的影響，要避免重蹈媽媽生命中的悲，就要從瞭解媽媽的生命史當中反思問題所在。」

當教育工作者有機會修正自己原先對於世界的認識，他/她的專業行動也可能因此不同。從這個專題探究出發，我相信，當準老師有機會認識與重新了解平凡女性的生命知識，看見女性多元層面的生命存在樣態，願意嚐試去理解不同種族、階級、身體能力的女性生命內涵，未來在教學上，或許比較有能力落實多元文化教育。例如書寫一位重度肢障的女性如何樂觀面對生命的 YR 指出：「在分析的過程中，我不斷的看見在台灣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裡，婦女是如何被對待的；而身為殘障的婦女，更是被用著具有歧視及偏見的眼光在看待著。然而，學教育的我，若以教育的眼光來看待這樣

的事情，總覺得透過教育，對社會以及文化的偏差觀念，是可以產生一些導正作用的。」

雖然聽起來政治正確，男學生 DY 在結論中，企圖連結這個知識生產跟未來教學的關聯，多少回應了我對這門課的期待：「這份研究讓我看見社會結構的框架是錯誤的如此徹底，因此我們在進入教育現場時，我們便要導正學生錯誤的刻板印象（例如爸爸要上班，媽媽要照顧小孩。），建立學生正確的觀念，不要再將可怕的社會結構框架套在女性的身上，讓女性的生命受到壓迫。同時，這份研究便是個活教材，它是個真實的生命故事，它可以讓我們當作教學教材，試圖對學生說裡面的故事，讓學生一起找問題，培養學生多元思考的能力，讓學生學會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並且讓學生不再對女性有錯誤的認知概念。」

最後，呼應楊幸真（2001）對於國內高等教育場域性別教育的批判，台灣的性別教育論述來自西方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研究的影響，似乎「缺乏與我們自己社會文化情境下切身經驗之連結與缺乏行動力……性別是離不開社會的，缺乏對個人在其特定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中相關性別成長經驗的瞭解，我們就缺乏推動改變的基礎與解放的動力。」在師資培育現場，開創機會讓學生透過探究，深入認識台灣社會文化情境下的性別切身經驗，再進一步與社會正義行動扣連，確實是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 王儷靜（2002）。教學原理教科書裡的性別訊息：*What is not said and what is said*。論文發表於「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高雄。
- 李元貞（1993）。體檢小學教科書—主題體檢：兩性觀。台北：台灣教授協會。
- 莊明貞（2003）。性別與課程理念、實踐。台北：高教出版。
- 陳玉玲（1998）。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嘉義：南華管理學院。
- 婦女新知（1988）。兩性平等教育手冊。台北：婦女新知基金會。
- 婦女新知（2001）。多「原」文化教育，教什麼？怎麼教？婦女新知通訊，226，12-15。
- 黃政傑（1988）。生活與倫理課本教些什麼？載於教育理想的追求（頁 111-123）。台北：心理。
- 黃政傑（1994）。兩性教育課程設計。論文發表於「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嘉義。
- 游美惠（2002）。親職教育論述中的性別權力與知識建構：從性別觀點檢視親職教育一書。論文發表於「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高雄。
- 楊巧玲（2002）。插花的女人—台灣的教育社會學用書。論文發表於「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高雄。
- 楊幸真（2001）。象牙塔內的性別教育：教學超越與轉換？論文發表於「性別、醫療與社會」學術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兩性研究中心，高雄。
- 劉美慧（2005）。多元文化師資培育：一位師資培育者的敘事探究。載於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教師的教育信念與專業標準（頁 203--230）。台北：心理。
- 歐用生（1985）。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意識型態之分析。新竹師專學報，12，91-125。
- 歐用生（1989）。質的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魏慧娟（1994）。國中國文教科書兩性形象與角色分析。論文發表於「兩性教育與教科書」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嘉義。
- 蘇芊玲、劉淑雯（1997）。檢視國小一年級國語科新教材兩性觀。論文發表於「體檢國小新教材的兩性觀」研討會，台北市教育局，台北。
- 蕭昭君（2002）。國小師資培育教導的是誰的知識？——教育專業課程教科書性別內容的初步檢視。論文發表於「檢視大專教科書性別意識」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高雄。
- 蕭昭君（2003a）。國小師資培育教導的是誰的知識？—教育入門課程教科書性別內容

的初步檢視。教育研究資訊雙月刊，10（6），19-44。

蕭昭君（2003b）。國小師資培育教導的是誰的知識？－語文教育入門教科書性別內容的初步檢視。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6，1-39。

蕭昭君（2005, June). *Who needs feminist education in Taiwan? Lessons from female cancer patients' lived experiences*. Paper presented in Women's Worlds 2005. 9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n Women, Embracing the earth: east-west/north-south. Seoul, South Korea.

Logan, J. (1997). *Teaching Stories*.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Wood, J. T. (1991). Politics, gender, and communication: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text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0 (January), 116-123.

投稿收件日：2007 年 2 月 13 日

接受日：2007 年 3 月 3 日

